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5-24・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02

直面香港：
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

項　　飚*

摘　要

香港「雨傘運動」不僅體現了「民主香港」和「專制大陸」之間的衝突，更反應了中國整體「黨－國」體制的內在矛盾。本文首先分析「佔中（環）」，即專業人士發起的關於特首選舉方案的運動，如何演變成全港表達普遍不滿的「佔（金）鐘」行動；指出雨傘運動是香港積累了十年的各種運動的總匯合。我們要看到雨傘後的複雜政治生態，更要注意多元的運動如何在「民主」與「自主」的訴求下匯合到一起。文章從而分析香港的「民主」與「自主」訴求是如何在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條件下形成的，和現實可能有哪些隔閡。文章最後分析，為什麼三十年前被各方認同的「一國兩制」在大陸改革開放、中港一體化的過程中反而危機重重？本文試圖解釋，問題不在於民主不夠，而在於中共角色的變化。總之，香港的獨特不是她和大陸太不一樣，而是她尖銳地顯示了中國政治的深層矛盾。本文也是人類學干預重大事件的一個嘗試，努力通過對實質性的社會聯繫的敘述來發現新的視角，而不是基於外在的概念進行判斷和歸因。

關鍵字：群眾運動、「外向型」民主、「黨－國」體制、領導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院教授。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3 : 5-24 • 2015

Understanding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Party Politics in Popular Movements

Xiang Biao*

ABSTRACT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late 2014 in Hong Kong manifested not only tensions between "democratic Hong Kong" and "authoritarian Beijing", but more importantly deep contradictions within China's own party-state system. The Umbrella Movement was a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social campaigns that sprung up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under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autonomy. This article traces how the notions of democracy and autonomy in Hong Kong emerged from its special historical and geopolitical contexts, and how those conditions have now changed and therefore complicated the pursuit of these goals. This article then asks wh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pproach, a consensus among major stakeholders thirties years ago, ran into deep trouble when China opened up and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intensified. I suggest that it i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tate, and not just the lack of democracy, that caused the current crisis. Hong Kong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not because it is distinct from the mainland, but precisely because it manifests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s a whole in a particularly sharp manner.

Keywords: popular movement, externally-oriented democratization, party-state system, leadershi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佔中」和「佔鐘」：香港社會的「運動化」和「超級事件」的形成

幾乎所有的媒體——香港的、大陸的、西方的，不管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把 2014 年 9 月 26 日以來香港關於 2017 年特首選舉辦法的街頭抗議，特別是 28 日以後升級的對峙，稱為「佔中」運動。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則應該注意到，佔中組織者在 28 日凌晨宣佈「佔中開始」，在事實中開始的不是佔「中」（佔領中環），而是佔「鐘」（佔領金鐘）。[1]「中」、「鐘」之別，不僅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佔中」是香港部分學界、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在 2013 年初發起的有關 2017 年選舉改革的運動。佔中組織者在發起後，積極宣傳動員、討論方案、與包括大陸在內的各方面接觸。他們計畫，如果上述努力無效，將佔領作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環，堵塞香港的經濟命脈，向政府施壓。

「佔鐘」則是 9 月 26 日深夜，因為部分學生爬入香港特區政府前的公民廣場被警察逮捕、而形成的全港性運動。[2] 27 日，大約 5 萬市民前往金鐘，聲援學生。28 日遊行人數繼續增加，傍晚警察發射 87 枚催淚彈，震驚香港。29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八所大專院校的學生聯合組織，簡稱學聯）宣佈無限期罷課。部分群眾在商業繁忙的旺角、尖沙咀和銅鑼灣設置路障、搭撐帳篷，進行「佔領」。29 日晚至 30 日間，估計近 20 萬人上街 「佔領」。為防禦警察的胡椒噴霧，人手雨傘一柄，遂成「雨傘運動」。[3] 10 月 20 日香港高級法院下禁制令，佔領者必需立即離開仍被佔領的金鐘和旺角。21 日學生代表和港府代表進行了兩個小時、電視直播的對話，但是沒有統一意見。12 月 15 日，銅鑼灣最後的佔領場地被清理，佔領運動結束。

儘管「佔中」和「佔鐘」所表達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即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改變其 8 月 31 日關於特首普選和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的決議，但是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中環是整個香港的象徵，金鐘是香港政府所在地。佔領中環，意在代表整個香港要求政制改革。佔鐘則是包括學生在內的各界市民針對香港警察和政府強硬措施的反應。不少佔鐘者並沒有積極參與對選舉方案的討論，也不贊同佔中的行動方案，但是 28 日以後走上街頭，表示要保護學生、問責港府。佔中組織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其決議後，計畫在 10 月 1 日開始佔中，預料參與人數不會超過數千人，而且沒有把學生當作主力。但是在 28 日凌晨，面對原來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人潮，佔中組織者臨時宣佈佔中「提前開始」。部分在場學生斥此舉被為「騎劫」（利用、撿便宜），一些人離開現場；立法會

臺灣人學術 期刊資料庫

民選議員及社運人士「長毛」梁國雄[4]多次下跪，懇求學生留下、支持佔中。[5]佔中組織者在佔鐘中被邊緣化，坦然承認自己無法左右運動。佔鐘人數眾多，沒有統一領導，形勢複雜。在以學生為主的金鐘「佔領區」，要求一國兩制下的民主、自治是主旋律，在尖沙咀有引人注目的「反中」和「港獨」的標語，旺角則上演了反對和支持佔領運動的市民間的衝突。

簡言之，佔中是針對北京的、規模有限但是主旨宏大的一項政治運動，而佔鐘則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港府的，規模龐大，但是起始主旨有限。佔中是有一個長期計畫、但是到最後並沒有實現的想法；而佔鐘是一個帶有偶然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發、突然形成的事件。

西方媒體不區分佔中和佔鐘，因為它們把這些運動都籠統地理解為「爭取民主」和「抗議北京」。香港反對派（即，以立法會中「泛民主派」陣營為主體的、平常扮演在野（反對）黨角色的政黨和社團；他們激烈反對人大的選舉方案，積極支援佔領行動。也稱「民主派」，與立法委員會中親北京的「建制派」相對）強調佔鐘是佔中必然發展，從而把政黨訴求呈現為群眾的呼聲。港府可能傾向於把二者綁在一起，以強化政府反對所有佔領行動的合法性，因為名義上是反對佔中，即維護全國人大的決議，實際上是反對佔鐘，即為維持現任港府的治理。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大陸的媒體不但沒有對二者作切割——比如把佔鐘定義為對地方政府處理手段問題的反應，著重討論應不應該用催淚彈等——反而一再強調前後之間的聯繫。背後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大陸媒體反復強調的以「合法－違法」為基本標準的立場。既然違法是佔中計畫和佔鐘行動共同的本質，所以要不加區分地反對。二是對事件性質判斷中的「黑手論」思維。黑手預謀佔中、領導佔鐘，重要的是抓這些黑手，街上的學生群眾怎麼說怎麼做不重要。三是對社會矛盾處理中的「事件化」思維。混淆佔中佔鐘，佔中提出的原則和方案問題演變成佔鐘引起的交通堵塞、生活不便、經濟被擾的問題，從而可以靠技術性和策略性手段處理。

但是，學者對佔中和佔鐘怎麼作概念上的分解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在行動者的意識中是同一個事件。不僅佔中、佔鐘密不可分，而且雨傘運動是 2003 年反對 23 條七一大遊行以來各類社會運動、社區運動、政改運動的一個總匯合、總爆發。香港這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非政治社會，這十年經歷了預想不到的高度政治化和「運動化」，即通過遊行、靜坐、集會等方式來表達各種政治立場，其動員範圍和立場的激進程度不僅遠遠超出議會政治，而且運動愈來愈和各類政黨分清界線，以凸顯其純民間性質。雨傘運動所以有這麼大能量，正是因為這一象徵性的雨傘巨大無邊，聚集了各種運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的力量。如果說人類學者的在一般情況下的任務是顯示被重大事件掩蓋了的日常生活、發現普通行動者眼中的意義，在 2014 年秋天的香港，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重大事件、行動者要表達的意義不僅彰顯，而且經常是意義大於行動、象徵比被象徵的內容更重要。所以人類學者不僅要辨析同一雨傘下存在哪些多元和差別，也要思考這些多元和差別怎麼匯合成為一個「超級事件」？我們需要直面這場運動，直接地從發生了什麼本身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不把它當作某個純粹理念（「民主」）的直接化身，也不把它處理成國際陰謀下的幻影。

這個匯合的邏輯所以值得關注，首先是因為，在這一超級事件的形成中，不但有可能以籠統的「民主香港對抗專制中國／大陸」的框架化解了各種運動的具體訴求，而且可能在事實中把「民主」和「專制」的關係轉化為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把一個制度的問題變成了身份認同問題。所以會有這一轉化，並不是「港獨論」、「族群論」特別有說服力，而是市民這些年直接感受到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大陸客的湧入，對大陸的反感情緒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驅動力。[6] 同時，針對一個明確敵人的反抗，從來就比建設性的議程更有號召力，而反抗就很容易把問題轉化成他－我關係。當運動告一段落，我們必須問：運動目標一時落空而形成的受挫感是否進一步強化了狹隘的本土論？原來多元而具體的社會運動經過這個超級事件後，是獲得了更多的能量，還是消耗了生命力？經過 2014 年的佔中，像 2011 年那樣反對金融霸權的佔中運動的社會基礎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7]

反抗型的運動化的邏輯值得重視，也是因為它可能導致對中共體制的理解的簡單化。「中國」被看作是一個巨大而又無形、無孔不入而又僵硬不變的專制體制。但是，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專制政治近乎瘋狂的時候，「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愛國民主」卻是香港青年中的一個主流口號，學生中不乏有全面心繫大陸的所謂「國粹派」；在 1989 當專制政治體現了它最血腥的一面之後，香港還是可以平穩過渡，印著「愛國愛港」的體恤衫在 1997 年賣得很好；而恰恰是在 2000 年以來，大陸空前開放、不斷給香港「送大禮」的環境下，「愛國」在香港成為一個明顯的貶義詞，「民主統一」變成了「民主反共」？雨傘運動強調港－中關係，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任何關係必然是歷史的、具體的、多層次和多面向的，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對立。中國時常被想像成一個突然君臨的龐然大物。但是香港獨特體制的形成，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在冷戰中的特殊位置、及其 1980 年代以來的變化密不可分的。在某種意義上，香港近二十年最大的政治變化其實不發生在香港，而發生在內地。不瞭解大陸具體怎麼專制，就無法有效地在香港推進民主。本文要做的，正是要在「關係」的視角下來審視雨傘運動的形成及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含義。我將先分析這次運動中的核心要求，即香港的「民主」與「自治（自主）」，如何是在歷史關係獲得了它們具體的意義，使得它們在運動中具有巨大的動員能力，但是也造成了它們的局限。然後我回到「一國兩制」的框架以及它和大陸「黨－國」體制的關係，問一個可以說是相反的問題：中共曾經具有的巨大說服、動員和整合能力，包括使得她當年能夠提出「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能力，怎樣陷入了危機？對於具體的雨傘運動，本文是一個局外的觀察，但是對港－中歷史關係的分析，本文的視角是內在的，即我的考察力圖從這個關係演變的本身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民主」、「專制」範疇出發。尤其在對中共體制的考察中，我將嘗試運用中共對社會主義政治的理解作為理論資源之一，來梳理其變化。這不是要把中共話語當作解釋歷史的準則，而只是要試圖從歷史內部解釋歷史。社會主義的話語，不僅被認為是和香港的情況格格不入，而且也在今天的大陸被看作是離奇神話。但是如果歷史成了無法解釋的荒唐鬧劇，我們又何從理解今天的困境？

運動化和事件化掩蓋了很多香港內部的社會矛盾和歷史聯繫，但是我們決不能認為運動化和事件化是一個虛幻的過程，它有非常實在的社會後果。最重要的之一，便是目前港－中關係看似僵局的特徵。在這一點上，香港的 2014 和臺灣 2014 有許多相似之處。太陽花運動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類似的超級事件。兩岸三地的這一新格局，不但有可能把我們帶入一個近乎無解、高度消耗的困境，而且一旦把政、經辯論轉化為身份認同的焦慮，三地已經在進行著的追求民主、公眾和多元的具體努力可能都會受到抑制，而狹隘甚至極端的民族主義已經在各地呈現。在這樣的歷史關口，需要多樣的人類學干預。我們既需要微觀細緻的民族志書寫，也需要直接挑戰主流的認識框架，重新展現社會構成過程中的聯繫，從而激發新的社會想像的可能。

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

2017 年香港特首的普選方案，是這次運動的中心議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發表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全國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通過關於特首選舉方案的決議，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2 到 3 名候選人，每個候選人必須得到 50%以上的提名委員會委員的認可，然後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2017 年的提名委員會為現在選舉委員會的延續，由 1200 名來自四個「功能界別」[8]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由各界指定的投票人按分配名額

臺灣考古學術期刊資料庫

選舉產生。反對者認為提名委員會的名額分配和選舉辦法不反映香港的社會構成，事實上傾向於工商界和所謂「親北京派」。規定每個候選人必需要得到 50%以上的提名委員會委員的認可才能出閘，事實上是斷絕了民主派執政的可能。「愛國愛港」的要求，沒有客觀標準，不符合基本法保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宗旨。他們從而提出，特首候選人應該由公民直接提名（「公提」），或者由各政黨提名，然後全港直接選舉，是為 「真普選」。

「求民主、保自治」不僅僅是一個選舉方案問題。對很多佔領的參與者來說，這也被視為解決其他重要問題的出路。首先，群眾對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極大的貧富差距、年輕一代（即「第四世代」）缺乏流動機會，日益不滿。地產和金融控的繁榮無助于普通民生。大學畢業生告訴我，近 20 年來大學畢業生工資上漲有限，而房租則漲了近 10 倍。這些問題所以和「民主」聯繫在一起，因為不少香港人認為，中央為了治港，支持、聯合香港的地產和金融資本，強化了社會不平等。「港人治港」實為「商人治港」。而大陸反腐中不斷揭露出來的中共高官把香港作為不法資產處理的基地，更引發紅色權貴資本統治香港的恐懼。近來曝光的香港公務員腐敗、傳統主流媒體（特別是電視臺）的缺乏中立性，也被認為是大陸方面干預過多的結果。部分港人認為，除非實現真普選，港府不會真正重視港人的意見、著手改變現狀。

其次，民眾對民主追求的急迫性，也和香港的國內、國際地位下降的危機感有關。香港的 GDP 不僅已經落後於上海、北京，也將被廣州、深圳超過；一向被港人多少瞧不起的新加坡也直追香港的國際地位。[9] 這一危機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香港坊間的一個普遍猜想是，香港對中國的經濟愈來愈不重要，而愈來愈成為政治上的一個是非之地。下金蛋的天鵝變成了不高興的小鴨。中央的重點可能不再是長期扶持，而是要加速處理。中央政府 2003 年特別是 2013 年以來的政策愈來愈強硬，似乎也印證了這種猜想。民主派由此覺得要加速行動，既然經濟上的優勢不斷下降，必須轉向政治上的壓力，以求「自救」。[10]

再次，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社會的隔閡，以及對中央政府的逆反情緒，也不容忽視。且不論自由行、大陸水貨客、孕婦產房床位、空氣污染、就業競爭等等 [11]，就是在關於普選方案的討論中，這一情緒也相當明顯。比如，很多學者、學生很不認同人大常委會的 8/31 方案，不僅是因為其對候選人的限定，也恰恰是因為其引入了「普選」。他們認為，讓香港一人一票選擇事先控制好的候選人，這意味著對香港選民的政治人格和尊嚴的蔑視，還不如不普選。一個大學生問我：「憑什麼把你自己想講的話硬塞到我們的嘴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裏？」在人大常委會發佈其決議之前，香港各方參與了政府主持的意見諮詢，提出多樣建議；但在不少人看來，人大的決議不僅沒有反映這些要求，而且選擇了幾乎是最苛刻的方案；甚至不願意做一點姿態性的妥協動作 （比如，即使不要求候選人有高達 50% 的提名委員會成員認可，北京照樣可以控制對特首的選舉）。不少溫和民主派甚至是親北京派也對人大的決議表示吃驚。國務院的《白皮書》更被不少人解讀為是一個給香港的政治威懾。這種對立感對運動後來的發展方向有重要影響。

因此，佔領派的民主與自治權的訴求有虛有實。實者，它有具體所指；虛者，它調動揉合了多種社會情緒。民主話語在這次運動中，特別能夠以實帶虛，形成巨大的動員力，是和它強烈的外向指示性聯繫在一起的：即它是直接指向中央政府的，是一個抗議型的口號。民主的內在過程和實質性效果——普選為什麼會增加香港的經濟公正？民主為什麼會提升香港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在當前情況下，香港的不同社會力量如何能夠形成有效有序的民主格局？——不一定很清楚。正因為它內在的模糊和粗線條化，對外才成了一個嘹亮的單音符。要理解這次運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就需要分析這一外向性。

外向性是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的一個歷史特徵。香港現在的民主政黨起源於 1990 年，是對大陸 1989 年的直接反應。由此，1989——這本來和香港本地社會關係甚小的事件——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重要的象徵之一。1992 年彭定康來港後，不顧前任和中方形成的默契、罔置倫敦方面的質疑，大力高速推進政治民主化。中國方面同時加緊在港培養扶植政團政黨。有人突然民主，有人突然愛國。今天「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對立決定香港政界格局，很難說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內部關係。香港民主的外向性又聯繫到它對形式化的政治民主（相對於實質性的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強調。香港的基本社會福利、法治建設和政治表達自由在 1970 年代以來港英政府控制之下基本成型，[12] 這些權益不是現在民主化的目標；民主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這也導致了民主運動中的綱領偏於抽象，比如佔中計畫強調人大的方案要修正，原因之一是它不符合「國際標準」。而部分民主派試圖把香港問題國際化，即利用其他國家和中國之間可能的矛盾關係給中央施壓，則把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推向極端。

外向性，不僅僅是指其民主化運動受外界因素影響、旨趣指向香港之外，也指其背後的一個基本預設，即民主化可以通過對現行不夠民主的體制的否定，解決一系列問題，而相對不重視現行體制的內在機制和可能反彈。[13] 在這方面，1989 年大陸的學生運動留下了深刻的教訓。1980 年代後期中國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對於官倒腐敗的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恨，以及對驟然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的不知所措，都被表達為對政治民主的追求。參與運動的學生人人以為，一旦民主之光照臨，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人們基於社會主義正義、平等的觀念對當時強權下的市場化的質疑，在運動中則被表達為進一步擺脫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關於究竟如何民主化，則幾乎沒有任何具體設想，只是要求個別領導人下臺。具體的社會矛盾被抽象地化約為民主的缺乏。這導致了三個對今天中國仍有深遠影響的後果：

第一，對社會問題的簡單化約造成運動期間的意見高度一致性，從而態度不斷激進，政治要求不斷提高，學生斷了退路。當運動的矛頭愈來愈指向到個別領導人身上時，造成了政治國家內部高層的分裂。直接導致了暴力性的全面鎮壓。[14]

第二，「民主」話語籠罩了 1980 年代初露端倪的各種社會問題，使這些問題長期沒有被細緻分析。民主夢被粉碎之後，知識人或下海經商、或上岸當官，或象牙、或犬儒。對那場運動的積極因素和局限都沒形成深入反思，從而不能對後來的社會變化提供分析性的參考意見。

第三，由於激進運動和反撲而造成的思想真空，1989 年後進入重要崗位的官員在經過 1989 到 1992 年之間的搖擺，既和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失去血肉聯繫，又對西方政治理念堅決排斥，從而以維護現存制度和追求現實利益為中心任務。1992 年以後的市場化高歌猛進、所向披靡，經濟不平等空前加劇。在 GDP 連連創高的光輝下，錢權聯盟在各層各界悄然成型。所以汪暉（1997，2008）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起源歸結於 1989 運動的起因和後果，是一個深刻的分析。

香港今天的情況當然不一樣，但是我們應該問類似的問題：究竟應該怎麼分析香港的金融和地產資本的地位？挑戰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在現實中究竟有哪些具體的撬動點和撬動器？香港和大陸、亞洲、世界的關係面臨著歷史性的變化，究竟該怎麼理解和應對這一趨勢？普選方案本身不能回答這些問題。相反，如果過於關注形式化政治民主的問題，可能讓這些真問題被隱藏起來。當運動過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變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體可能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可能變本加厲。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可能只為以新面目出現的保守勢力提供合法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方「不管」下的自治

如果說民主訴求的外向性是間接的，那麼自治權是直接對外的。在雨傘運動中，對自治的要求其實比對民主要求更強烈。「香港不能變成另一個中國的城市」，這是一些民主派的疾呼，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擔心。香港確實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城市經濟體。但是，香港的自主性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今天又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香港的自主是由她在 1997 年以前，相當特別的殖民地地位決定的。香港是英國事實上的殖民地，英方保護其安全，保證基本的秩序；但是她又不是正式的殖民地，英政府抱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想法，沒有在香港實行「深度殖民主義」。在香港島的精英沒有被深度英化，更不用說九龍城的三教九流了，從而使香港的日常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英方推行典型的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商業貿易儘量少受公共福利支出、勞動權益保護等「社會外部性」的干擾（這當然和英國本土在戰後的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很多來到香港的新移民，也抱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想法，一心追求經濟上的生存和發展。這樣，香港的經濟可以說是純粹自由資本主義的典範。她更像是一個一切都在隨時流動的集貿市場，而不是歷史沉澱成的一方水土。她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接納各色人等前來角逐，收進場費、賺茶水錢。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受約束、自主自治，但是這也導致是香港作為一個社會的政治性格的缺失。[15] 港英政府在 1970 年代以後吸引華人精英從政，一方面允許華人社會在經濟和日常生活上自主，另一方面又防止這一社會自主性政治化，防止它導致和政府完全隔裂甚至對立。也即，所謂的自治，是在嚴格的政治關係界定（即港英政府和當地社會之間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下的一種行政管理方式，而非政治意義上的自治。[16]

香港這一經濟高度自由、政治性格缺失的特性，又為她在二戰以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特殊的優勢。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起飛，是和冷戰格局密不可分的。由於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被排除在被西方控制的世界市場體系之外，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孤立（既是選擇了孤立，也是被孤立），不僅為其他亞洲國家留出了巨大市場，而且使它們獲得西方的支援，以優惠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去。而香港又有其他小龍、小虎不可比擬的優勢，即她幾乎壟斷了孤立中的中國和西方之間貿易。香港的自主自治不在於她的獨立性，而是正是因為多方需要這個非政治的平臺和門戶；其自主自治不是她自有一套政治民主，而恰恰是因為她是沒有政治主體資格的前提下多方「不管」的自由港；其繁榮不靠內生，而由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特殊位置決定。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的開放，世界格局大變。中國不一樣了，香港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位置也必然不一樣。

因此，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是和中國的黨－國體制形成的歷史沒有直接關聯。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各方原來對「一國兩制」發展軌跡的預想的落空。大家原來想像，大陸經過改革開放，會和香港逐步自然接軌；而現在彼此在某些方面甚至愈行愈遠。背後的一部分原因是，香港的從 19 世紀晚期的發達來自於它的政治主體資格的缺乏、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的政治性格的曖昧；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的「崛起」，則得益於其在長期革命和在冷戰對美、蘇孤立中而形成的鮮明政治性格，以及對於政治自主原則的堅持（如不輕易跟從西方的經濟政策、習慣於用政治角度分析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充分關注彼此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只是抽象地給雙方貼上「民主」或「專制」的標籤，將無助於溝通。香港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性格曖昧固然可能使之民主訴求具有外向性，但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中央政府現在基本屬於失語狀態，無法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特別是具體的政策選擇，明確表達出來。這就需要對中國的黨－國體制本身做分析。

黨－國體制的變化？

在對一國兩制的諸多討論中，大部分論者關注這個構想背後的考慮，比如當時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中央對香港的「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一貫思想、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客觀影響等等。但一個沒有引起充分注意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當時鄧小平能夠提出這樣的構想？鄧小平顯然意識到一國兩制可能會帶來種種衝突，但他認為這些衝突是次要的麻煩，不應該阻礙方向性的戰略判斷。為什麼三十年後，麻煩顯得如此棘手？這只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問題嗎？

在論述一國兩制的意義時，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工作三年的法學家強世功，不僅追溯到中共對西藏、臺灣問題的解決思路，也將之和中國漢唐以來的帝國型態相聯繫；認為這種國家主權的多樣的內在構成方式是中華民族存在的特別方式，具有「長歷史」所賦予的合法性。[17] 以世界之大、人類經驗之豐富，統一主權下多樣治權的形式是否是中國獨有，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的實踐確實不同于源于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本身是一個理想類型，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真正符合這一模式。在這裏似乎不宜把具體實踐和一般理論之間的差異理解為類型的不同。與其把一國兩制的構想看作是千年天朝的延續，不如首先把它理解為現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條件下的生動實踐，從而考察它和歷史上的主權構成的具體異同。

從歷史上看，一個統一的國家主權容納多樣次級政治主體，可能一般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它需要一個超越國家機器的主權象徵，比如帶有多樣宗教身份的清朝皇帝和維多利亞女皇。現代國家實現其主權的方式所以比較單一固化，是因為國家機器通常是代表主權的唯一機構。[18] 是不是可以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扮演了這個超越國家的主權體角色。這個角色有它的歷史性。中共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線索是其強大的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和自上而下的組織制度建設的結合與交叉。由於前者具有顛覆性，後者具有保守性，這樣的結合是獨特的。在 1949 年以前，中共以革命、推翻執權者為基本使命，但是她發展地方蘇維埃、建立根據地、形成解放區，在這些地方推行土地改革、發展經濟、頒佈法律法規、試驗民主治理、開展思想鬥爭「整風」運動、進行意識形態動員和控制，獲得豐富的治國經驗。「武裝割據」的戰略意義，正在于把局部建設和全國革命結合在一起。局部的建設使全國革命具有持續性。如果在 1949 年之前是以建設支援革命，在 1949 年之後，是以革命運動的方式推進建設。1949 年之後中共在很長時間裏依然是一個「執政的革命黨」。這使得中共同時具有強大的群眾動員和社會控制能力，既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政黨，也超越了作為官僚體系的國家。[19] 正是基於中共的特殊地位，鄧小平可以提出一國兩制。如果在一個多黨民主體制下，既有的邦聯或者聯邦的體制會得到維持，但是很難進行從無到有的創新，引入新的國家構成的方案。典型的專制體制一般是脆弱的，往往依靠狹隘的民族主義等右派勢力，比在民主體制下更難做出這類的體制創新。

第二，它需要強大的意識形態和高度的政治自信，比如殖民主義時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文明進化論，清帝國以儒學以核心的天朝思想，以及 1980 年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意識形態在當時都得到精英分子的真心認同，同時對大眾也有相當的說服力。在解釋為什麼說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鄧小平（1993）在 1988 年明確說：「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正是基於這一對未來「不需要變」的歷史判斷，才形成「不能變」的現實策略。也正是基於對「不需要變」的判斷，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一國兩制決不是「信口開河」。

高度受認可的權威和強大意識形態的結合，形成了「領導權」。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各種論說，特別是葛蘭西、列寧、托洛茨基到毛澤東的關於革命運動的理論，我們可以初步認為,現代政治中的領導權應該包含三個因素。一是對歷史發展方向的展望，在宏大的歷史脈絡下說明政黨的使命，從而使得政黨擺脫一時一地的利益要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求，也不被保守的政治要求（如捍衛傳統信仰、捍衛民族利益）所挾持；二是要有嚴明的紀律、發達的組織，從而有能力發動廣泛群眾；三是有一個強大的幹部隊伍，即來自各界群眾、信念決定、以身作則的優秀分子。如毛澤東強調的，幹部隊伍是重中之重。領導權不僅是政治上要有正當性，理論上有說服力，而且還要有道德上的吸引力、情感上的親密性。這是靠一個個的幹部日復一日，以身作則「做」出來的。幹部是黨和群眾的具體連接點。有了幹部就可以發展出政治理論和有效組織；沒有了和群眾保持血肉聯繫的幹部，那麼意識形態將空洞化，嚴明的組織紀律可能成為獨裁的工具。幹部的作用也把領導權和控制權區分開來。領導權總是要在創新探索中去爭取，在面對不斷的挑戰中發展，而不是靠一套既定的體制機械地控制。領導權離不開群眾路線。領導權是從實踐著的「領導力」中浮現出來的權力，而控制權是要先對權力關係作界定，從固化的權力關係中得到對社會生活的主導能力。當政黨對其領導權有高度自信，而機械性的控制力相對弱化的情況下，其政治想像力往往是最豐富的、創新能力最強。[20]

中共對領導權的自信，是 1951 年關於西藏的「十七條協議」，1981 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的「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即「葉九條」），和稍後對港「十二條」的提出的共同背景特徵。不管是在建國初期還是文革後撥亂反正，中共開拓新局面、自信在領導一項必然得到人們支持的偉大事業。除了對香港、臺灣，中共強大的領導權也是 1950 年代和 1980 年代少數民族政策創新的條件。

1990 年代以後，一國兩制構想提出時的原初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1989 年使中共的領導權受到空前的挑戰，其應對策略是發展新的技術性的治理能力。1992 年以來的經濟市場化，似乎重新確立了社會共識、強化了執政黨的威權，但是 1990 年代以來的「發展主義」和 1980 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重要不同。1980 年代的發展是硬道理多少是一種意識形態，其「硬」是具有實質性、說服力的硬，有精神飽滿的一面；而 1992 以後的發展是硬道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各種社會問題失語失策的反應、是對社會矛盾掩蓋和「消化」的手段，其「硬」是手段的硬、強加的硬。「三個代表」的提出，標誌著中共希望調整她原來的領導權的基礎，即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工農代表的身份，轉而在形式上追求成為全民黨。其機械控制力的增強，行政權覆蓋面的擴大，與其實質領導權的下降，構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2003 年中共強調弱勢群體利益、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樹立親民形象。但是由於沒有正面觸及各種深層矛盾，社會不平等在此間反而加劇，出現了中央政府的道德化（如「為民請命」），而地方政府行為功利化甚至愈來愈具有掠奪性的格局（項飚 2010）。「維穩」成為解決各種問題的法寶。種種維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劣行怪像，恐怕不能只歸咎於個別人，因為整個政治體系是一個「維持」體制。2008 年以來又出現一個轉折。國家財富的高速擴張（體現在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少數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壟斷式發展、地方政府對土地等稀有資源的投機式的運作），西方的經濟危機和由此帶出的全世界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反思，強化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主義理論。「中國模式」、「中華文明崛起」、「道路自信、體制自信」的論述是這一變化的反映。但是這種威權自信和領導力是兩回事，而且它可能正掩蓋了領導力下降的事實。

一國兩制的「兩制」，在官方語言仍然被定義為「大陸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這樣的定義顯然和現實有所不符。[21] 對很多人來說，現實中兩制間最明顯、最直接的差別是一黨和多黨的差別。但是我們不能簡單把一黨等同於專制，多黨等同于民主，從而斷定前者必然被後者替代。如前所述，正是強大的一黨執政的「黨－國」體制，才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成為可能。一黨和多黨的關係也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黨派之間對權力的爭奪。問題主要不在黨和黨之間的關係，而是黨和國家的關係。正是因為黨在當時相對的超越性，她可以構想「一國」中容納「兩制」甚至多制。如果黨和國家高度同構，黨沒有以超越于國的姿態領導國家，反而要依靠國家而存在，那麼，這樣條件下的黨缺乏領導權，「國」缺乏彈性和包容力。

香港的問題，之所以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地方－中央分權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次主權」、具有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是因為大陸的地方－中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黨的行政化（官僚化）來協調的。地方和中央之間的經濟利益和行政權力的博弈，歸根到底是靠黨的自上而下的幹部人事任命來決定。黨和地方社會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有機聯繫，在很大程度上被黨本身的行政化、黨和政府的同構化而削弱。換句話說，黨對國家機器的整合，取代了她對社會生活的整合。在香港，黨既不能以行政化的上下級手段管治，也沒有發揮其傳統意識形態、和地方社會發生有機聯繫。而和港商形成默契、進行半公開的、以利益連帶為基礎的委託式管治，則正是目前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用「分權」以及「主權－治權」關係的框架分析香港問題，只能揭示問題的一部分。香港學者劉兆佳（2012）又指出了中共和香港的關係中另一個糾結。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當然也是香港的執政黨，但是在香港她則不參與選舉，甚至不公開存在。這為種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埋下了伏筆。89 之後，中共失去了像司徒華這樣的戰友，而愈來愈靠李嘉誠這樣的「合夥人」。在意識形態上不能闡釋自己的立場，而愈來愈靠物質利益、操作手段來滲入。中共在香港的半地下狀態，又使香港成為大陸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官大宗錢權交易的一個天堂。

所以，香港的問題不是她和大陸太不一樣，而是她以獨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國政治整體的深層矛盾。在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中共的領導權是和其長期的武裝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文革」的檢討上分不開的。同時，香港在當時沒有政黨力量，不存在政治理念和話語的競爭。香港今天的運動揭示了新的挑戰，即歷史上的多次革命無法再成為合法性的自然源泉，同時政治訴求的多樣化明顯上升。這一歷史挑戰，在大陸同樣存在。香港的困局，確實提出了中共應該如何爭取對國家的領導權的問題。

真正的政治過程往往在運動結束後開始。運動的成敗，不能只看它當時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在第一時間得到滿足。任何追求一步到位、一勞永逸的運動都是虛幻的。只有不停息的運動才是真實的和成功的運動。如果運動的具體要求都得到滿足，但是基本的經濟社會關係沒有改變，那麼這可能就是失敗的運動。「阿拉伯之春」就是一個眼前的例子。[22] 相反，具體目的沒有立刻達到固然是一時的失敗，但是如果它能激發社會的熱情，並把一時激起的革命性衝動轉化為持久性的進步社會力量，那麼失敗可能正是成功。1989 年大陸的社會運動失敗了，不僅僅是它被鎮壓了，而是它沒有轉化成積極的持久力量，甚至沒有變成一種有效的思想資源。知識界沒有對運動作及時的總結，沒有對運動之後的、在日常秩序下展開的潛伏政治作持續耐心的干預。雨傘和太陽花，不管我們對它們作為事件怎麼評價，它們都開啟了新的政治過程。人類學可能起的作用，並不在於為思考提供一個統一的框架、一套共同語言——我們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一些貌似不可挑戰的普世話語，比如主權、民主，其實不能表述我們身在其中的多種社會矛盾——而是要把兩岸三地之間、各種社會力量之間具體的內在聯繫和斷裂仔細地敍述出來，反對絕對化的主權思想、空洞化的民主話語、和本質化的本土主義。

附　註

1. 中環和金鐘在日常用語中指這兩個地鐵站的周邊地段，它們同屬香港島上的中西區，相互連接。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金鐘則由於 2011 年香港政府總部大樓的落成而成為行政中心。
2. 9 月 22 日週一，香港 25 個院校發起為期一周的罷課，表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決議不一致的意見。罷課不是佔中計畫的一部分，而且學生的要求和佔中組織者的方案有比較明顯的差距，更加激進，比佔中方案得到更少市民的認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6 日週五進入最後一天，學生聚集在金鐘政府大樓邊上的添馬公園。同日香港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因為相同原因，舉行一天的罷課行動，學生也往金鐘聚集。由於添馬公園經政府批准被某社團借用慶祝國慶，學生轉移到公民廣場附近。公民廣場本來是開放的公共空間，在 2012 年 7 月「反國民教育」遊行後設圍牆。26 日深夜 100-200 名學生越過圍牆爬入廣場，74 人被警方圍封，若干領頭學生被捕。

本文中對「佔中」到「佔鐘」的資訊，來自對香港和各國（地）中、英文媒體，特別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相關報導，和我本人在 10 月 5 日至 8 日間在香港當地的觀察。卓嘉健和梁雅茜提供了重要幫助，謹致謝意。

3. 警察在 9 月 26 日開始使用胡椒噴霧，有人撐傘防禦。「雨傘運動」的說法在 27、28 日間開始見諸媒體。但是雨傘的使用規模在 28 日後驟然增大，而且出現示威者用雨傘攻擊警察的情況。

4. 梁國雄，現屆立法會議員。曾經是香港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的核心成員。因為信奉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不斷運動，幾次被捕，在立法會中多次成立和退出不同的政治團體，但是一直屬於民主派。因為留披肩長髮，綽號「長毛」。

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cupy Central is on: Benny Tai rides wave of student protest to launch movement」（Sung et al. 2014）。南華早報來自香港、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記者和編輯團隊在報導這次運動中展示了高度的專業精神，為各方間的理性溝通提供了重要諮詢基礎。早報的團隊是香港和大陸社會完全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一個例子。

6. 多遭港人詬病的「自由行」政策，即為 2003 年「非典」後的香港經濟走出低谷，發揮了重要作用。

7.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9 月間少數香港青年市民佔領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前廣場，發起「佔領中環」運動。這是一場直指香港政治經濟問題核心的運動，但是參與者寥寥，對市民幾乎完全沒有號召力；和 2014 年的政治化了的佔中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8. 此四界別為（1）工商金融界，（2）專業界，（3）勞工、社會、宗教界，（4）政治界。

9. 根據在廣州的中國智庫智穀趨勢（Trigger Trend）2014 年 8 月的報告，1997 年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 GDP 佔中國總 GDP 的 15.6%，2013 年只佔 2.9%。2010 年，上海 GDP 超過香港，2011 年北京超越，預計到 2017 年廣州、深圳和天津將均超過香港（Lu 2014）。

10.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一看法。香港本土主義派就認為這是大陸故意「唱衰」香港，從而施壓的策略。他們認為香港在對中國人民幣境外業務的開展等戰略考慮還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香港應該大膽說不。這把香港對促進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的功能，和香港對民主價值的追求直接聯繫起來。

11. 水貨客指在香港以自用消費的名義購買手機、電器、箱包、食品等，不經過報關而運入大陸境內，進行轉手倒賣的個體商戶。水貨客是過境貿易中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2012 年以來，大陸水貨客的大量購買造成香港市面上嬰兒奶粉短缺，從而引起社會不滿。

孕婦產房床位問題是指，2001 後，來香港產子的大陸孕婦日增，造成香港本地孕婦無法定到床位的問題。2011 年後矛盾凸顯，一部分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或者刊登廣告要求限制大陸孕婦來港。

12. 香港是在沒有民主、在「行政吸納政治」的格局下獲得這些基本權益的。但是這並不意味整個歷史過程是非政治性的。香港民生在 1970 年代的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是 1967 年帶有暴力性的、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的激進「反英抗暴」運動。港英政府正是從這次運動中吸取教訓，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而採取了一系列改革。

13. 指出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更不是要否認香港市民對實質性民主的一貫的追求。從城市公共事務到大學校園生活的管理，對民主的追求每天都存在。這裏強調的是 1990 年代以來以政黨的興起為代表的正式民主化，和 2003 年以來的運動化。

14. 鄒讜在 1990 年成文的「天安門」（1994）中，把 1989 年的悲劇性結果歸結為在「全能政治」體制下協商機制的缺乏。即在這一格局下，各方面都認定，退即敗、敗即死，政治博弈從而變成生死搏鬥。鄒讜在文中寄希望於國家與社會的和解與重建，期望「當局可以從道義的大錯失和意識形態的枯竭之中獲得道義上的拯救和之中上更新。同時，某些學生可以擺脫他們之中上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從缺乏能力處理顯示世界問題 的境地，將他們自己轉型為新的公民、忠誠的反對派，最終成為負責任的領導者。黨－國家與社會的和解將會促進中國與世界輿論的和解。」（鄒讜 1994：203）。在這一方面，香港比 1989 年的北京已經好很多。我感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譚同學先生提醒我關於鄒讜的論述。

15. 我們可以把「政治性格」初步定義為一個社會經過歷史鬥爭而形成的在處理國內國際事物的立場和趨向。經歷了武裝革命的社會通常有較強的政治性格，比如越南較之泰國，南北韓較之日本，法國較之英國。它們對社會成員有較強的認同要求，有成型的政治意識形態，習慣於立場較量而不是見機行事。但是政治性格強不就是好事，它可能成為負擔，令社會付出極高代價。政治性格強弱是客觀歷史演進的結果，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對自己所處社會的政治性格和其歷史形成有清晰的把握，從而才使分析不落空。

16. 強世功（2007）對此做了精闢的總結和分析。同時參見 Ian Scott （1989）。

    但是同時也需要指出，香港主體性的缺失，也有大陸方面政策的原因。中央政府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不但沒有考慮要「解放」香港，貫徹將其提倡的反殖民主義，反而對英國政府可能的「去殖民化」政策，包括給香港更大的自主權和民主，都十分警惕和反對。中央政府這麼做，是希望將香港事務嚴格局限在中－英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而反對香港成為第三方參與，所謂「三腳凳站不穩」。

17. 強世功（2008a，2008b）。關於中國的歷史上的帝國和現代國家的關係，近來不少學者做了論述，如汪暉（2004）、葛兆光（2011）。

18. 按照歐洲經典的民族－國家理論，現代國家與其說是對家族、部落的超越，不如說是對它們的延展；因為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個同質的「人民」意志之上。

19. 這和汪暉（2013）指出的，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具有「超級政黨」和「超政黨」的雙重要素，有直接的聯繫。根據汪暉的說法，所謂「超級政黨」是指競爭中的國共兩黨均不以形成議會框架下的競爭型政黨政治為宗旨，而以形成霸權性政黨（或稱領導性政黨）體制為目標。所謂「超政黨」是指兩者的代表性政治並不同於議會框架下的多黨或兩黨政治。它們更接近于葛蘭西所謂能夠代表未來的「新君主」。

20. 有關論述見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1902），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論新階段」（1938）、「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等。

21. 很多人可能覺得現在的香港比大陸更具有社會主義因素。我 10 月 7 日在香港中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學討論時，一個學生問：「在中國整個國家都在走向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香港作為一個城市能單獨地實現社會主義嗎？」

22. 2010 年底，從突尼斯開始，阿拉伯世界興起了波浪式的、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巴林等國政府被迫下臺。其運動以受過較好教育、面臨巨大就業壓力的城市青年為主體，以大規模遊行示威和通過互聯網動員、協調為主要手段，以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為主要口號。西方媒體稱之為帶來新一輪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之春」。但是到 2012 年中，阿拉伯之春演變成為「阿拉伯之冬」。雖然群眾運動迅速地顛覆長期執政的獨裁政府，但是沒有真正深入農村、深入工農，沒有形成有效民主建設。革命後的國家或者被原教旨式的宗教勢力把持，或者被軍人掌控，或者陷入內戰。

引用書目

汪暉

1997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5：133-145。

2004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

2008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北京：三聯書店。

2013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後政黨的政治」〉。《文化縱橫》1：18-27。

強世功

2007 〈行政吸納政治的反思〉。《讀書》9：3-11。

2008a〈一國之迷：Country vs. State〉。《讀書》7：34-41。

2008b〈一國之迷：中國 vs. 帝國〉。《讀書》8：32-39。

項飚

2010 〈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10：117-132。

葛兆光

2011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

鄒讜

1994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鄧小平

1993 〈要吸收國際的經驗〉。刊於《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頁 67。北京：人民出版社。

劉兆佳

2012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香港：商務印書館。

Lu, Rachel

2014 Report: Hong Kong Becoming 'Mere Second-Tier' Chinese Cit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

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ng, Timmy, Ernest Kao, and Tony Cheung

2014 Occupy Central is on: Benny Tai Rides Wave of Student Protest to Launch Move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601625/hong-kong-students-beat-us-it-benny-tai-declares-start-occupy-central?page=all, accessed April 10,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